



中国藏学史（1950—2005）

History of China Tibetology (1950-2005)

王启龙 阴海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史 (1950—2005)

History of China Tibetology (1950-2005)

王启龙 阴海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学史(1950—2005)/王启龙,阴海燕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161-3424-5

I. ①中… II. ①王…②阴… III. ①藏学—历史—研究—中国—1950—2005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385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桐
责任校对 王福仓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52.25
插页 2
字数 919千字
定价 12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 (1950—1965)	(8)
引言	(8)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12)
一 文章	(13)
二 著作	(21)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的研究	(25)
一 文章	(25)
二 著作	(36)
第三节 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	(42)
一 文章	(42)
二 著作	(52)
第四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	(54)
一 文章	(54)
二 著作	(67)
第五节 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79)
一 文章	(79)
二 著作	(84)
本章小结	(86)
第二章 中国藏学研究的沉寂时期 (1966—1976)	(91)
引言	(91)

2 中国藏学史(1950—2005)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94)
一 文章	(94)
二 著作	(96)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的研究	(97)
一 文章	(97)
二 著作	(100)
第三节 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	(101)
一 文章	(101)
二 著作	(102)
第四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	(102)
一 文章	(102)
二 著作	(105)
第五节 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107)
一 文章	(107)
二 著作	(110)
本章小结	(113)

第三章 中国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1977—1985)

引言	(115)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121)
一 文章	(121)
二 著作	(144)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的研究	(148)
一 文章	(148)
二 著作	(174)
第三节 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	(189)
一 文章	(190)
二 著作	(207)
第四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	(212)
一 文章	(213)
二 著作	(236)
第五节 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248)
一 文章	(248)
二 著作	(259)

本章小结	(265)
第四章 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 (1986—1995)	(270)
引言	(270)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274)
一 文章	(275)
二 著作	(303)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的研究	(311)
一 文章	(313)
二 著作	(339)
第三节 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	(358)
一 文章	(359)
二 著作	(382)
第四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	(406)
一 文章	(406)
二 著作	(438)
第五节 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450)
一 文章	(451)
二 著作	(462)
本章小结	(467)
第五章 中国藏学步入稳定发展时期 (1996—2005)	(475)
引言	(475)
第一节 政治与经济的研究	(479)
一 文章	(479)
二 著作	(511)
第二节 历史与地理的研究	(524)
一 文章	(525)
二 著作	(558)
第三节 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	(578)
一 文章	(579)
二 著作	(634)
第四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	(668)
一 文章	(669)

4 中国藏学史(1950—2005)	
二 著作	(719)
第五节 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740)
一 文章	(741)
二 著作	(763)
本章小结	(781)
主要参考文献	(789)
人名索引	(810)
后记	(827)

导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在与祖国其他兄弟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吸收与促进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具有独特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灿烂文化，而且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②。藏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历史上，从华夏民族形成伊始，中华文化也就随之构建；以后，不论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着这一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各个兄弟民族认同的共同文化传统。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学界提出了构建“中华学”^③的构思，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构架下，以研究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为核心的学科——藏学，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1949年前的中国藏事研究，我们已经另有专门著述^④，该书所谓1949年前指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本书所谓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按：以下简称“费孝通等”，全书注同此例。）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③ 萧君和：《中华学》，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中国藏学史(1950—2005)

1949年指的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以前的中国藏学经过传统(萌芽时期,1840—1911)到现代的蜕变,经过西方科学研究方法东渐之后的改造,在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境遇中经过创立时期(1912—1937)和艰难发展时期(1938—1949)。社会各界对藏学研究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藏学研究机构 and 团体不断增多,藏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布局日趋合理,中国藏学的研究队伍和学术体系逐步形成。于道泉、根敦群培、法尊、才旦夏茸、任乃强等一大批藏学家,注重藏汉史料的比照研究,注重实地调查与理论相结合,开创一代中国藏学研究之风气,对新中国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于道泉在远赴巴黎从师巴考(J. Bacot)教授之前就在国内发表了《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情歌》(1931),被誉为“中国现代藏学的发端之作”。^①根敦群培是藏族学术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大师,其代表作《白史》^②在写作方法上一改以往藏族高僧、学者以注疏、叙述为主,宗教色彩浓郁,缺少考证和辨析的传统著述风气,注重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年代、事迹的考证,对神话与历史的区分,对中国现代藏学影响深远,比如恰白·次旦平措等人即是这一史学流派的重要传人。^③可惜的是,由于遭受反动统治者的迫害,根敦群培在新时代曙光初现之际就过早陨落!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沁园春·雪》中所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在我国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此时,中国藏学经历风雨,迎来春天,开始步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重视藏族人民和藏区的人民解放

① 王尧编著:《我与藏学》,载《藏学概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 除根敦群培的《白史》外,有一部蒙古文著述亦称《白史》,是《十善福经白史》的简称。该书是一部宣扬“政教合一”政体的政治学著作,书名称作《Arban buyan-tu nom-un ayan teüke》或《Mongyol ulus-un arban buyan-tu nom-unayan teüke》。人们一般把《白史》看作一部史书,其实书中并没有多少历史记载。

③ 王尧、陈庆英:《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事业。1949—1950年，东部甘、青、川、滇藏区基本上获得了解放。随即，中央派慰问团到这些地区去慰问长期受压迫的藏族人民。西藏方面，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长期羁留青海省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发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祝贺并且表示衷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代表广大藏族人民希望早日解放西藏。^① 1949年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回电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② 党中央从西藏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下，北京、四川、甘肃、青海、西康、西藏等地藏族同胞纷纷要求解放西藏，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③ 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是当时一项十分急迫的政治任务，反映了藏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顺应了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和潮流。与此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支持的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却加紧了在西藏的阴谋活动，妄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④ 在此特殊背景下，为了满足广大藏族爱国人士的强烈愿望，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主张，并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的战役，19日昌都解放，藏军主力被歼灭，少数反动分子以武力阻挠西藏解放的企图被粉碎。于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爱国力量增长，并成为促进和平解放西藏的主要力量。这样，1951年2月西

① 参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自青海省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1949年10月1日）》，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参阅《（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自青海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载《关于西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32开，第220页。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14、18、21、25、28页。

④ 194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的露丝·培坎提出备忘录，公然支持“西藏独立”，8月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父子被派往西藏，同噶厦官员夏格巴建立秘密联系，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同年7月，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直接支持西藏地方少数反动分子，制造了驱逐国民党驻藏人员出西藏的“七·八”事件，妄图在国民党政府覆亡之际，彻底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藏地方政府正式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赴京谈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后，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解决自己内部民族问题的高度智慧，反映了广大藏族同胞的心声和愿望，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拥护。从此，把百余年来在我国领土上指手画脚、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实现了我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揭开了西藏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政府部门组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另外，在中国的不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中也有不少研究室、课题组或个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①众所周知，以往的“国外藏学”是在资本主义扩张进程中，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导权。^②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藏学研究的中心是在国外的

① 1951年6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派出以北京大学地质系李朴教授为队长的中央文委西藏科学工作综合考察队，包括地质、地理、天文、畜牧、医药卫生、社会、民族、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专业工作者，共40余人，11月到达拉萨，开始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央人民政府制定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52年11月1日，西藏藏文版《新闻简讯》在拉萨创刊。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报》(藏、汉文版)创刊，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发挥了强烈的舆论宣传和报道作用，至今成为报道西藏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媒介。1958年，中共西藏工委组织了70人左右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专家学者紧密合作，对西藏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走遍包括昌都、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在内的西藏大部分地区，获得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

② 朱晓明：《立足新起点，抓住新机遇，开拓新局面——庆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载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话，那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降，藏学研究的中心开始逐渐东移，中国藏学在进入现代藏学时期后，也开始步入建设藏学故乡的历史征程。西藏和平解放后，整个藏族地区都获得了解放。党和国家对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的工作尤其是民族文化工作高度重视，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搜集、整理、出版藏文化古籍，维修文物，注重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事业也因此步入了新生的春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于1951年正式成立，于道泉教授创办并主持藏语系的工作，为新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然而，正当藏族各界拥护执行《十七条协议》，西藏经济社会百废待兴之时，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受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很快平息了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坚持“边平边改”的方针，不仅彻底废除了旧西藏上层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摆脱了备受奴役的三大锁链，即官家（封建农奴政府）、寺庙和贵族等三大领主，而且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清除了阻力。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时，全国其他藏区基本上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了由农奴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经过民主改革，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到来。这时，藏学工作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不仅界定了西藏的社会性质，为藏族地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而且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积累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奠定了初步研究基础。^①在民主改革后，藏族民族聚居的社会发生了历史性飞跃，广大农奴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获得了极大解放，同时也为中国藏学研究开拓了广阔前景。在西藏，尤其是1965年自治区成立后，以藏学研究

^① 1959年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妥善保护各种文献古籍，修缮了部分历史古迹，搜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共21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发掘保护藏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工作也普遍展开，搜集、整理了大量藏族民间音乐和舞蹈资料；整理、改编了一批藏戏传统剧目；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民谣、寓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分别汇编整理成册，并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遗产开展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还先后举办了5个佛学研究班，着手整理浩如烟海的西藏佛教经典。1964年5月10日，中国科考队在定日县挖掘出1.5亿—2亿年前的巨型古脊椎动物化石。

为主要特色的西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藏族界人士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发掘、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外,还培养了一批藏学专门人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已经开始筹划建立藏学研究的园地,但在紧接的十年“文革”中西藏研究被列为“禁区”、视为“复辟”而滞留于胎中。^①中国藏学在新生时期的良好发展局面,在“文革”时期(1966—1976)受到了严重破坏,包括藏学研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近于停滞。于是乎,时代在进步,停滞不前实际上就是在倒退。这一时期,藏学研究成果寥寥,令人痛心。在“文革”末期,《西藏日报》编辑部从1975年12月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西藏历史研究》^②,可以算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筹建藏学专门刊物之肇始。^③

“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中国人难以忘却的痛苦岁月,开启了中国学术春天的真正来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绿了祖国大地,而且也吹绿了藏学的园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西藏及藏区发展,高度重视藏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及其他藏区建设,使藏族地区真正改天换地,藏族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党中央、国务院一次又一次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藏区形成了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潮流。这一潮流将不时发生的反潮流杂音(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多次煽动的分裂破坏活动)荡涤殆尽!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藏学得到了顺利的发展,经历了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1977—1985)之后,昂首进入了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86—1995)和稳定发展时期(1995—2005),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藏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藏学研究人

① 多杰才旦:《西藏学研究刍议》,载《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年12月。

② 丹增:《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③ 比如,《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就选载了原载于《西藏日报》编辑部编《西藏历史研究》第4期的文章——《举世瞩目的布达拉宫》(邬朝贵),原载《西藏历史研究》第4期,1978年12月。按:《西藏历史研究》由《西藏日报》编辑部编辑,从1975年12月开始出版,一直到《西藏研究》创刊之前。为内部刊物,基本上一年一期,出版月份不定,如第4期为1978年12月,第5期为1979年6月,第6期为1980年4月,第7期为1980年6月。

才新人辈出，薪火相传，成就斐然，为西藏及藏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藏学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其所包容领域之广泛、发展成果之丰硕，完全是1949年前难以想象和相比的。特别是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藏学专刊——《西藏研究》的创刊（1981年12月）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成立（1985年12月）并成为独立的事业机构为起点，标志着中国藏学学科最终从民族学中脱离出来，中国藏学按照国际学科划分的标准得以确立。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藏学领域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重要标志。自此以后，中国藏学研究在国家层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经费支持等方面，都已经为中国藏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好了充分准备。至此，中国现代藏学学科得以真正确立，并开始步入繁荣发展时期。

我们将在本书分五章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藏学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重要成就和辉煌历程，力争勾勒出新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了使整个中国藏学史的体例保持前后一致，在本书中我们仍按照《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①的撰写格式行文。本书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至2005年间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至于为什么不包括2006年之后中国藏学研究的著述，主要是因为学术成果产生后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和学术界的认可，因此暂不收入，待一二十年后如有需要我们再做不迟。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文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可能有些重要的著述未能提及；由于笔者学识所限，文中所述难免有所偏差，甚至是错误。希望学界朋友多多指出，以便日后逐步完善。

①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章 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1950—1965)

引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创建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紧接着开始,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开始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新阶段。

新中国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指出了光明前途和解放道路,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中国成立之时,甘肃省省会兰州市、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均已获得解放,甘青地区藏族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和阻挠,冲破困难,奔呼相告,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藏族聚居地区。到1949年底,甘肃省藏族地区和青海省东部、环青海湖地区各族人民先后获得解放。1950年初,青海省的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洛、玉树藏族牧区获得解放。1950年3月，西康^①全省获得解放。同时，在已经获得解放的藏族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建政工作。在当时，西康省是藏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解放后最先建立了西藏自治区^②，组成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接着由乡到县的人民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四川、云南两省的藏族地区，也在1950年中陆续建成县级人民政权。甘肃、青海两省藏族地区在废止保甲制度的基础上，从1949年、1950年解放初期即逐步建立区乡一级的基层政权，然后在各县民主建政。1950年，在甘肃天祝县首先建立了县级自治区。到1951年，甘青地区先后完成了县、专区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建政工作。在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等五省境内藏族各个聚居地区获得解放和民主建政的同时，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热切期盼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仍未获得解放的土地——西藏。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周密布置和认真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多路向心”的策略，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个方向向西藏和平进军。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最终获得和平解放。1959年3月，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党领导人民在西藏高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为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千百年来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挣脱了身上的锁链，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获得解放之后，本时期(1949—1965)^③各个藏区先后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广大学者满怀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学研究，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他们把藏学研究当成保卫边疆、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更多地直接奔赴藏区开展调查研究，因此，中国

① 西康省，简称康，原为中华民国1939年设置的行省，政府驻地康定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被废止。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② 自治区，是一种行政区划名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统称为“自治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自治旗）三级，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当于省，为中国最高一级行政区——省级行政区。

③ 这里1949年指的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讨论的藏学论著大多是1950年以后的作品。